

郁龙余编

中西文化 异同论



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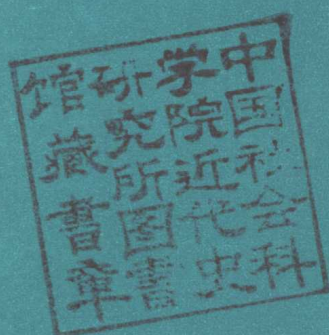
HANGTAIHAIAWAZHONG



LINCING

郁龙余编

中西文化 异同论



中国文化书院文库·论著集

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

责任编辑：周健强

封面设计：董学军

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

中西文化异同论

ZHONGXI WENHUA YITONG LUN

郁龙余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125印张 169,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108-00220-5/G·26 定价 3.75 元

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编委会：

主	编	汤一介			
常务副主	编	封祖盛			
副主	编	景海峰			
编委	庞朴	李泽厚	金春峰		
	郁龙余	刘小枫	林英男		

目 录

总 序	汤一介 (1)
前 言	郁龙余 (6)
中西文化之异同	朱 炎 (22)
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	唐君毅 (31)
从“心理距离说”谈到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吴 森 (51)
中外政治哲学“史的发展”的比较	鄢昆如 (62)
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	罗 光 (88)
创生性范畴之分析	成中英 (102)
——论怀德海与宋明儒学之类同与分野	
中西形上学之所以异趋与现时之彼此同归	张君勱 (127)
时间与超时	成中英 (139)
——希腊人与中国人的观点	
从东西方的哲学思想看生的意义与死的价值	何秀煌 (145)
中西宗教精神的异同	罗 光 (155)
《周易》与《新旧约全书》	谢扶雅 (162)
——中国最古经典与基督教圣经之比较	
中西道德之异同	黄建中 (170)
中西道德的不同	吴 森 (184)
中美婚姻观念的不同	吴 森 (197)
中西文学之比较	余光中 (211)

总 序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诗经·大雅·文王》

为了进一步开展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促进海内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加深彼此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相互了解，介绍三十多年来港台地区及海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情况，我们编选这套《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

近几年来，我们祖国大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而且这种研究中国文化以及探讨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热潮可能还会继续发展。在开始一个阶段，一般地从宏观方面展开讨论，是必要的，这样做可以使人们了解到研究中国文化及其发展对中国走向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的研究不能停止于此，要深入下去。如何把中国文化和它发展的前景问题深入地研究下去，可以从多方面努力，例如，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的研究、某一专门文化问题的研究、断代文化史的研究、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的研究、国内外文化现状的调查和研究等等，这中间也许具体地专门文化问题的研究应受到重视。我们编选这套《港台海外中国文化研究论丛》，就是想按专题把当前港台海外这方面的研究介绍给读者。当然所编选的十个或更多的选题，还是比较广泛的，所选的内容是否完全合适也有待进一步审查。但是，由于我们过去对港台地区和其它国家研究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多，首先较系统地介

绍给读者也许是必要的。如果有可能，我们还想编辑选择一些更为专门问题的资料，提供给读者参考。

“中国文化”是指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它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指现实的中国文化？是指所谓“大传统”还是“小传统”？我想，也许“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很笼统和含糊的概念，它可以从各个方面去研究。不过，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好，“现实的中国文化”也好，或是“大传统”、“小传统”等等，研究这些问题，都和“传统和现代化”这个问题相联系。而“传统和现代化”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外古今”问题。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应如何处理；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与今天的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应该说从中国历史上曾经较好地解决过，这就是从公元一世纪到十世纪对印度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中国文化吸收了印度佛教，一方面它保存了印度佛教，另一方面又改造了印度佛教。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专门的文章讨论过，这里不需要再多写了。但有一点可以说的，就是充分地吸收外来文化不仅不会使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中断，而且会大大促进自身文化传统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西方文化十七世纪初传入我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起初由于政治的原因人为地中断了西方文化的传入，在鸦片战争以后又是被动地（被迫地）接受西方文化，因而使得我们国家的文化总是处在落后的状态。有的学者担心吸收外来文化会使自己的文化中断，所以反对所谓“全盘西化”。我想，不必有此担心，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全盘”的，但是较充分地吸收适应现代化要求的西方文化，却是完全必要的。

我想，只要是真正关心中国文化发展前途的人，都会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没有经过认真的批判和改造之前，它对我们国家

实现现代化的负面作用是大于正面作用的。但是要人为地斩断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是不可可能的,而且是不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没有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就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日本能充分吸收西方文化,还是因为他们能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他们的民族传统文化,相反,印度由于不能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因而也就很难真正实现现代化。

庞朴同志在一次会上提出应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文化传统”是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流向;而“传统文化”应是指已经过去的文化,是一个静态的凝固体。对后者,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历史上的现象来研究,可以肯定它或者否定它,而对前者,则是如何使之适应时代来选择的问题,因此它将总是一有特殊性(或民族性)而又有当代时代精神的文化流向。不管人们愿意或者不愿意,一个能延续下去的民族的文化总是在其文化传统中,而且不管如何改变它仍然是这一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且就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在“欧洲中心论”破除之后,文化是在一“全球意识”下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中。在这种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激荡中,世界的总体文化才能是丰富多彩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曾说过:“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共同的精神财产,民族的片面性的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这里的“文学”是用“Literatur”一词,译者注说:“这句话中的‘文学’Literatur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书面著作。”文化的研究似乎应是由国别的(或个别民族的、地域的)研究,而进入到比较文化的研究,然后才可能有一对世界文化的总体研究和了解。所以照我看,

当今文化的发展必定是“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结合。如果没有“全球意识”就不可能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来看文化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反映这个时代的要求，从而必然要游离于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轨道之外，这样的文化是不可能有什么生命力的。但是，如果没有“民族意识”，就不可能创造出有特色的文化来，没有特色的文化只能是一种“东施效颦”的文化，它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不会有贡献的。所以今日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有长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它的文化发展将一定要这两种意识结合起来，而更应注意充分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以便创造出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化。我们知道，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既保持其文化传统又能充分吸收各种适应时代要求的外来文化，并且超越其传统文化。所以固守“传统文化”的“国粹主义”和“本位文化论”都是不和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发展的。

当前研究我国的文化发展，我想切忌急功好利，要潜下心来系统地作一些理论上的分析，我们的国家需要一批真正能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思想家，他们应该是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总结出有科学价值的现象，从而为我们的文化传统的流向指出一个发展方向。我想这样一批思想家应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既然我们的中国大陆已经结束了“闭关自守”，而实行了“开放”政策，看来大门是再也关不住了。因而是取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还是取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是大不一样的，能取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会主动得多，会更有利于我们实现现代化。

我们编选一套海外港台有关中国文化问题的书，也许对我们了解外国和港台地区的学术发展有些帮助。虽然我们编选了这套书，但并不是说书中的观点我们都同意，而只是介绍他们的观点，让我们了解而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我们的国家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老的国家，但是我们正在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新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古老而又常新，
将是所有的中国人所向往的。

汤 一 介

一九八八年一月

前 言

中国文化的前途何在？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前后，国人对这个问题展开过大讨论。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派：一派主张全盘西化，无条件地、全面地、彻头彻尾地照搬西方；另一派针锋相对，主张固守本位，拒绝一切外来文化。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所谓“中西之争”。

这两派中，都有一些头面人物充当旗帜。他们互相攻讦，扭成一团，各不相让。恰恰在这段时间里，中华民族变得愈加衰弱，内乱外患日益严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邻日本。日本向西方开放、学习的历史并不比中国早。开始时，洋学家、汉学家与皇学家也互相争吵不休。然而，到公元1868年明治维新，睦仁天皇向国民发布了五条誓文，其中第五条的内容是：“求学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把向世界开放、向各国学习，作为民族振兴的基本国策。“和魂洋才”的口号，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经过不懈的努力，日本成功了。“一种以完全不同于英国资本主义的精神来管理的资本主义经济，一种把日本的精神和西方的技术结合起来的经济在日本建立起来了。”（日本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日本从一个受人欺侮的贫弱国家，变成了世界强国。

在强烈的中日对比下，人们不能不对昔日的“中西之争”进行

反省和重新评价。同时,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孙中山提出的“中国传统,西洋精华,自己创见”的主张,是多么正确。中山先生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应该是“取其善果,避其恶果”。(赵英敏《孙中山先生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台湾《政治评论》第八卷第三期,1962年4月10日台北出版)中山先生主张文化交流,在中西文化精华(善果)的融合中,创造出新的文化。这条交流、融合、创新的道路,是中国文化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既否定了食古不化、国粹至上的固守本位文化论,也批判了盲目崇洋、以民族虚无为基调的全盘西化论。

二

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一靠自身的创生更新能力,靠自己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积累与进步;二靠外来文化的不断补充、丰富、启发、刺激,在与外来文化的磨擦、搏击、竞争、交流、融合中发展壮大自己。这二者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历史上,许多曾经繁盛一时的文化,后来一个个衰亡了。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其缺乏健全的创生更新系统,没有突破传统的能力;有的是由于种种因素,缺乏与外界文化的接触,不能在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中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今天,世界上几大主要文化,所以繁荣、昌盛、发达,无外乎它们具有强大的创生更新能力,并且在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中汲取营养,大大地壮大了自己。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文化的发展与文化交流密不可分,没有各种不同文化的互相交流、融合、创新,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无从谈起。那么,文化交流是如何促进文化的进步与发展的呢?

(一) 维系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在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人类创造的文化,常常有失传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说:“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页)历史证明,只有进行充分的文化交流,才能维系文化的连续发展,防止中断与失传。

大约三千年前,古希腊人开始崛起,他们“通过文化交流,从东方的腓尼基人那里学到了字母文字,从埃及、巴比伦人那里学会了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天文、数学、几何等等。在艺术创作方面,他们也是从学习东方开始的。”(朱龙华《希腊古典雕刻》,见《外国古代文化艺术》一,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38页)古希腊文化后来居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与繁荣。后来,古希腊为古罗马所灭。古罗马只是部分地继承了古希腊文化,古希腊卓越的学术传统没有得到继承。自罗马帝国衰亡,欧洲便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的黑夜之中。古希腊的学术几乎被欧洲人全部遗忘,大量古籍也散失殆尽。然而,古希腊的学术并没有就此而失传。这完全应该归功于文化交流,归功于阿拉伯人。他们曾大量收集、翻译了古希腊的学术文献,使其得以保存。十字军东侵,欧洲人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古代文化。“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4~445页)他们还了解到,阿拉伯人是古希腊文献的主要保存者。于是,欧洲出现了一个学习阿拉伯语的热潮,将译成阿拉伯语的大量古希腊文籍,重新译成拉丁文等欧洲文字。当

时,阿拉伯语人才缺乏,他们在西班牙兴办翻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欧洲的学者也大量来到西班牙,从事翻译与研究。到了十三世纪左右,通过翻译阿拉伯文献,欧洲人基本上了解了古希腊的学术思想,重现了古希腊文化的光辉,使之得到了继承与光大,直接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与近代文明的到来。

(二) 加快文化发展的速度

在人类之初,个人有可能单独完成某些最简单的发明创造。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发明创造纯粹由个人单独完成的可能性愈来愈小。因为有了一定文化积累之后,文化的再创造离不开现有的积累,谁也不能拒绝继承、借鉴前人的成果与经验,谁也不能拒绝向周围的人学习请教。我们古人所说的几位开创祖业的圣人,不论是有巢氏、燧人氏,还是伏羲氏、神农氏,实际上都是众多无名氏发明家的代表。他们的发明创造,通过交流得到传播、继承和发展,避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的局面。这就大大加快了文化发展的速度。

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冲破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变得日益重要。而这种交流与合作又极大地加速了文化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曼哈顿计划”的实施成功,便是典型的一例。

这项代号为“曼哈顿计划”的研制原子弹的工程,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武器计划。为此,美国集中了本国以及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十五万人的科技大军,还有丹麦、意大利等国的科学家,动员了五十余万人的力量,前后花费了二十二亿美元,终于在1945年研制成功。可以说,原子弹的研制成功,是当时国际文化大交流、大荟萃的结果。不然,不可能这么快就取得成功。

文化交流中,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些国家的古老智

慧,在另一些国家开出灿烂的现代之花。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被尊为“兵学圣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拿破仑在战争中经常阅读,德皇威廉第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看到《孙子兵法》时叹息道:“可惜二十年前没有看到这本书。”今天,《孙子兵法》在国外的影响已不限于军事,它已被应用到经济领域,来指导企事业的经营管理,取得了很大成功。其中,以日本为最早、最积极、最有成效。据报道:在日本,不但搞军事和国防的人把《孙子》看作必读物,甚至在日本最狂热的棒球场上,运动员对《孙子》的警句也能脱口而出。一名叫大桥武夫的企业家还著了一本《用兵法经营》的书,宣扬如何用兵法经商。据说,他的公司采用了这种理论后,效率大大提高,业务飞跃发展。这位企业家说:“这种经营方式比美国企业经营更合理、更有效。”(参见李世俊等《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日本企业家常以《孙子》轮训干部,将《孙子》作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两根柱子之一,学习研究《孙子》蔚然成风。在美国也有学者著书立说,极力推崇《孙子》中含有管理的思想。

在日本,还流行一种“帝王学”,研讨“创业艰难,守成不易”的问题,教导现代企业家应该学习中国唐太宗居危思安、求言纳谏、任用贤良、自奉节俭的品德。现在,“帝王学”一词已在日本企业界广泛流传。

(三)调节各国文化平衡发展

世界上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里,由于气候、地形、水土、矿产、植被、动物群的差异,以及历史条件的不同,所产生的文化虽然在本质上都是对愚昧、野蛮的否定,但是在风格、气质、发展的程度及侧重面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这就构成了各民族文化发

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交流中渐趋平衡，接着又产生新的不平衡，然后又进行新的交流。就这样，文化交流不断调节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向前发展。

倘若两种文化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当，它们之间的交流主要是协调风格、调节花色品种、互相取长补短。这类文化交流，常常是友善、和平的。例如，中国汉唐时大规模地引进印度文化，经过了近一千年的时间，成功地消化、吸收了印度文化，极大地丰富、壮大了自己。其间，虽然佛道、儒佛之间发生过一些矛盾，甚至出现过几次宗教徒称谓“法难”的事件，但时间都较短，冲突不算激烈，比起国外的大规模宗教仇杀来，简直就算不了什么。造成这种和平引进的原因很多，如佛教戒凶杀、引进过程长等，但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封建文化处于鼎盛时期，具有博大深广的胸怀与包容万流的气概。

倘若两种文化的发展水平高低相差悬殊，那么它们的相遇有可能是敌对的，甚至是流血的。一部西方殖民史便是充分而有力的证明。在殖民者的枪炮下，文化交流变成了文化侵略。一些民族连同他们的文化濒于灭绝，如夏威夷、澳洲的土著民族；一些民族连同他们的文化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如非洲黑人、美洲印第安人；即便是文明古国，也在劫难逃，如印度做了英国几百年的半殖民地、殖民地；号称“天朝”的中国，有着最为发达的封建文化，也长期深受列强之害，沦为半殖民地。殖民者客观上将这些国家与西方近代文明联系起来，各国人民借此进行文化交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历史的进步来弥补殖民者所造成的灾难与损失。

今天，人们应当正视过去的历史：文化发达的国家应真心实意地提携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决不可以文化为凌小欺弱的武器；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应加强文化交流的自觉性，应时顺势，成竹在胸，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文化交流。当然，文化交流对于文化不发达的

国家来说,主要是引进外国先进文化,利用“移植优势”,以收“人耕我获”之效。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知识重新创造所需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能够大大缩短通往现代化的路程。

综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异质文化间的互相交流、融合所发生的效应,决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加法或乘法所能表述的。因为,这只能表明数量的增多,并不能表明质量的飞跃与突变。跟自然界存在的杂交优势一样,两种不同的文化互相交流、融合,就会结出数量大大多于双方、质量大大优于双方的新果实。

三

文化交流,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有着自己的规律。了解这些规律,对于我们认识文化交流,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具有实际的意义。那末,文化交流主要有些什么规律呢?

文化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历史上看主要有迁徙、贸易、传教、殖民、战争、旅游、留学、图书往来、外交活动,等等。这些形式往往互相交错,如传教与殖民、殖民与战争、贸易与旅游、旅游与留学等等,常常是兼而有之,难分彼此。文化交流的形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今天,随着历史的进步,一些文化交流的形式被淘汰、否定了,例如传教。宗教的传播曾经在文化交流史上起过巨大作用。因为宗教徒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又有坚定的信念与非凡的毅力,为了弘法传教,他们不避艰险,所以,在交通困难的古代,文化交流的重任常常落在他们的身上。我国汉唐时,佛教东渐,其间出现了安世高、鸠摩罗什、真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外国传教者,以及以法显、玄奘、义净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求法者,给我们带来了风格迥异的